

WAIGUO ZHIXUE · 23 ·

外国哲学

第二十三辑

商务印书馆

外国哲学

第二十三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哲学. 第23辑/赵敦华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121-3

I. ①外… II. ①赵… III. ①哲学—国外—丛刊
IV. ①B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003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外 国 哲 学

第二十三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121-3

2012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frac{3}{4}$ *

定价: 50.00 元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协办：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编辑委员会

主编：赵敦华

执行主编：杜丽燕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卞崇道(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

邓晓芒(武汉大学)

杜丽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傅有德(山东大学)

韩水法(北京大学)

贾泽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靳希平(北京大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

唐热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谢地坤(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翟振明(中山大学)

张志林(中山大学)

张祥龙(北京大学)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

程 炼(武汉大学)

杜小真(北京大学)

冯 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韩林合(北京大学)

韩 震(北京师范大学)

江 怡(北京师范大学)

刘 闾(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尚新建(北京大学)

孙永平(北京大学)

徐向东(北京大学)

姚卫群(北京大学)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赵敦华(北京大学)

卷 首 语

《外国哲学》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至1998年共出版十四辑,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外国哲学的新学风、新传统,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经与商务印书馆商议,从第十五辑开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承担《外国哲学》的组稿、编辑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外国哲学》稿件的学术水准,我们采取了国际学术刊物通行的“双盲”审稿制度。除了继续发表对外国哲学历史和经典的诠释性论文外,本刊将特别注重发表史论结合、批判性评论、中外哲学比较等方面的佳作。我们衷心希望全国同仁鼎力襄助,不吝赐稿,把《外国哲学》办成群贤毕至、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

《外国哲学》编辑部

2002年4月

目 录

执行主编的话	1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3
陈启伟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纪念熊伟先生百年诞辰	5
王 炜 于天人之际,求自由之真谛——忆熊伟先生	13
陈嘉映 说,所说,不可说 ——读熊伟“说,可说;不可说,不说”	21
陈小文 守护存在——纪念熊伟先生百年诞辰	25
胡塞尔研究	29
汪堂家 意志现象学的转折	31
李忠伟 胡塞尔式的“意向对象”概念 ——作为现象的“意向对象”	47
王 俊 世界现象学中的存在问题——晚期胡塞尔论存在 ...	68
郑辟瑞 Zugleich:自身意识的反思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80
蔡文菁 “先验语言”的可能性:胡塞尔与芬克之争	98
石福祁 浅析胡塞尔现象学对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的影响	111
海德格尔研究	137
柯小刚 理性与沉思: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中 关于科学的反思	139
朱清华 海德格尔的 ἀλήθειᾱ	155
朱松峰 “实际生活经验”与海德格尔“转折”后的思想	173

2 目 录

方向红	谁是“非现象学的”？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相互指摘及其意义	185
梁宝珊	科学人性观的存在论分析	202
梅洛-庞蒂研究		219
宁晓萌	试论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中的“肉身”概念	221
李婉莉	从“身体”概念看梅洛-庞蒂哲学 对心身关系问题的探索	244
王亚娟	梅洛-庞蒂：自然反思的两间性 ——兼谈 <i>ambiguïté</i> 的汉译名	256
现象学视野		273
庞学铨	唯我与共生——新现象学对 主体间关系问题的新解决	275
张志扬	存在：神、人、物——的角逐？	304
张祥龙	为什么个体的永生在世是不道德的？ ——从《哈里·波特》到儒家之孝	309
丁 耘	心物知意之间：《大学》诠释与现象学	326
李 菁	任何一种后-存在学的存在之思是如何可能的？ ——勘探维特根斯坦的存在历史位置	341
熊伟先生与现象学		361
黄凤祝	熊伟先生的波恩岁月	363
李婉莉	存在、现象与理性——“纪念熊伟(1911—1994) 诞辰 100 周年现象学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 现象学年会”会议综述	376

执行主编的话

记得是 1979 年左右,读大三时,有幸聆听熊伟先生讲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刚刚步入哲学殿堂,对西方哲学只知皮毛,青涩无知、接近外行,对于先生讲授的内容似懂非懂。然而先生器宇轩昂的仪表,“信手拈来世已惊”的授课风格,述经叙理之平实独特,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2011 年,是熊先生百年诞辰(1911-1994),2012 年,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庆典(1912-2012),作为两个百年的纪念,本期《外国哲学》以“纪念熊伟诞辰 100 周年现象学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现象学年会”的论文为主,出版熊先生纪念专号。30 多年后的今天,能为先生编辑纪念文集,不胜荣幸之至。

本期《外国哲学》由六个栏目组成。

第一个栏目:“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栏目标题取自陈启伟教授回忆文章的标题。这一组文章是熊先生的学生们提供的。文章的作者年龄悬殊,经历各异。读这组文章,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文章从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角度,勾勒出先生鲜明的人格特点和风骨:“淡定、闲雅,谦而不卑,彬彬有礼。”陈启伟教授盛赞先生的人格生活态度,以“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概括之。王炜教授等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中感受到:“在先生看来,人生在世求的就是这个在世之在的‘真’。有了这个‘真’,就有了人生在世的自由。存在之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陈嘉映教授认为,先生“说,可说;不可说,不说”中所云:“说不说可说不可说,看来终是第二层的,第一层的,是做。立功、立言,终是

第二层的,第一层是立德。这‘恬然澄明’四个字,非先生之谓欤?”陈小文先生指出:“熊伟先生对中国现象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翻译上。”“进行翻译也好,阅读翻译也好,总是要搔着痒处,否则就不幸了”,形象地表达了先生的翻译理念,也是“熊译”独树一帜的主要原因。

读先生学生及亲炙弟子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恍然间看到先生的音容笑貌,人格学问,清朗朗地从字里行间走出来。先生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品行,有教无类的育人理念,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让人感动、感慨、感佩!先生一生都在求在之真理,究天人之际,求自由之真谛。在先生看来,人生在世,求的就是在世之真,“有了这个真,就有了人生在世的自由。存在之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王炜教授本期文章语)王炜兄在文章中问“求到了吗?”愚以为,先生求到了。中国学人的境界“立德、立言、立功”先生都做到了,能将学问与人格完美结合者,得道者也!

第二个栏目“胡塞尔研究”由六篇文章组成,第三个栏目“海德格尔研究”由五篇论文组成。从这两组论文能够清晰地看到熊氏语言、思想和风格影响的痕迹。第四个栏目“梅洛-庞蒂研究”有三篇论文。论文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梅氏对于身心关系,特别是对于肉体的探讨。受笛卡尔影响,法国哲学直到今天依然关注身心关系问题,尽管笛卡尔是世界哲学家,不仅仅是法国哲学家。第五个栏目“现象学视野”,内容比较宽泛。意思是现象学视野中的东西方哲学。之所以冠以“现象学视野”,是因为这组论文或是方法、或是问题、或是视角……均与现象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六个栏目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勾勒先生早年学术历程、探讨先生博士论文的论文。一篇是熊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综述,综述真实完整地记载了会议情况。

由于本期是熊先生纪念文集,稿件遴选的标准是内容需探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问题。又因与会者人数多,论文篇数多,故除个别论文以外,绝大多数论文长度限制在1.2万字左右。因此,也不得不让作者忍痛割爱。篇幅所限,情非得已。

杜丽燕

2011年1月26日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①

——纪念熊伟先生百年诞辰

陈 启 伟

熊伟先生是我一向非常尊重、非常敬佩、非常爱戴的一位老师。值兹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谨以深切的怀念之情，追忆往日与先生在哲学系和外哲所长期共处，无论于覃思治学抑在为人处世所受教受惠于先生者，稍挹点滴，述诸后学，或可使其略窥先生作为一位大学者，作为一位真正哲人的气度、节操与风范。

我是1952年冬由山东济南负笈来京，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的。那一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文、理科合并，组建新北京大学（即今日的北大），校址由城内沙滩迁至西郊燕园（原燕大旧址），而新北大

的哲学系则不仅兼收此三校的哲学系，而且将在京的辅仁大学和外地几处大学（武汉、中山、南京）的哲学系皆囊括其中，一时间哲学系真是人才济济，举国哲学精英几尽萃于斯矣。熊伟先生也正于是年由南京大学转来北大。记得是在12月初哲学系全体师生开会欢迎我们这届新生时我才从高年级同学的介绍中知道了包括熊伟先生在内的许多教授的名字。不过在之后的两三年间我们与这些教授并无多少交往，因为他们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唯心主义者”，他们自己正在“思想改造”，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还不能走上讲台，向学生讲授他们的那一套哲学思想。熊伟

^① 文天祥《正气歌》。

先生自不例外。

大约是1955年秋季我读大三那个学期,哲学系请一位名叫什尼可夫的苏联专家给我们讲“哲学史”,实际上就是拿一本现成的讲稿照本宣科,并不讲解阐述,内容也是干巴巴的,哲学家的思想学说不过是若干教条和结论的堆砌,听了以后并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到了那个学期末,为了满足同学们求知的欲望,系领导决定请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几位先生到我们班上来作“辅导”。我们分做几摊听讲,我那一摊是熊伟先生和苗力田先生讲的,他们先要我们提问,然后主要对希腊哲学部分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解说。同学们很高兴,事后议论说,这些老师才是真正的西方哲学专家,为什么不让他们开课讲授呢?对此我们深以为憾。不过毕竟要感谢这次短暂的课外“辅导”,使我们有幸第一次与熊伟先生当面接触,亲聆教言,开始了此后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

1956年我在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就分配在熊先生所在的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后改为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不过在我的记忆里,

熊先生当时被借调到历史系,为一位名为洛赫的德国专家讲授德国史做翻译工作(课堂口译和讲稿笔译,其百万字的《德国史》译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正式出版),大约1958年之后才回到我们教研室。我那时已在教研室攻读研究生,不做教学工作,但常被要求参加教研室的活动,特别是时事政治学习活动,因此得与熊先生不时相见。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早的一件事情是1958年上半年学校开展所谓“双反”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是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不久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思想改造运动。运动要求教师们“向党交心”,“抢西瓜”,把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思想(包括政治的和学术的)统统揭露交待出来。我们教研室大概是哲学系运动的重点之一,竟有一位中宣部的干部亲临督导,运动伊始,他就向大家宣读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法国革命对以往的一切都进行“最无情的批判”的话:“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不啻是向在座的被斥为“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先生们提出挑战。有的先生

情绪激动,愤然直言自己马克思主义还没学好,依然相信昔日所学的哲学,有的先生听了别人的批评,勃然作色,反唇相讥;而熊伟先生则迥异于是,他遭到的批评分量很重,不仅被逼问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信仰,而且被追究从大学时代开始的与胡适的交往,然而他在回答问题和自我批评时既甚诚恳,又很淡定、闲雅,谦而不卑,彬彬有礼,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任何波折、委曲和打击面前都能为此豁达以对,泰然处之。对于熊伟先生的这种生活态度、处世风格、心胸气度,我总是想起苏东坡《留侯论》中的一段话:“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我觉得熊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勇者”,而这种“勇”所展示的他那崇高的心志和抱负则正是其为一代哲人的本真所在。

熊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回到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特别是六十年代的三、四年间,在教学科研和翻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据我所知,主要是: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二、德国哲学史上个别人

物和学派的研究;三、海德格哲学的批判研究及其著作的翻译。

熊先生早在被历史系借调为德国专家开设的《德国史》课程做翻译时就时常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且曾购买许多本德国进口的马恩德文原著(我手上的德文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恩合著《神圣家族》就是熊先生所赠),我相信他无疑是那时北大教师中直接从德文原著接触研读马恩经典著作最多的一位。六十年代初他翻译了恩格斯的历史名著《德国农民战争》,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熊先生作为著名的翻译家,也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为马恩著作的翻译而时相咨询求教的专家。熊先生在马恩著作翻译上严谨精审的学风我有亲炙亲历的感受。大约1962—1963年间,我们(北大和人大哲学系的)几名青年教师请熊先生教德文,他欣然同意,答应每周讲一次并选定马恩的两篇论文(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作为教本。熊先生的教学法就是逐字逐句地讲解,对其语法结构做详细的

分析,对每词每句的涵义给出精确恰切的说明和翻译,使听讲者既学习了德文,又受到极好的翻译的示范。如果我今日在德语的读、译上略微有一点功底,那完全是熊先生之所赐。

熊先生在六十年代对德国启蒙思想家福斯特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我们过去的哲学史课,讲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对于福斯特这位18世纪德国最杰出的革命民主派和唯物主义者竟只字不提,对于19世纪中叶在德国政治、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对马恩思想的形成有过重大影响的青年黑格尔派也从来无人涉猎其书,讲论其学说。熊先生视此为我们学术工作上的一大缺憾。因此他费大力气去查阅了可能找到的有关书籍,搜集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写出了部分的书稿,其中个别章节曾作为讲义刻写件发给教研室同志。六十年代中期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先是下乡搞“四清”,继而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熊先生对这一段德国哲学史的研究不得已而中断,“文革”后先生虽曾

就此题目发表过篇把文章或做过若干次讲学,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终于未能如原先所计划的那样把这一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以底于成,噫嘻惜哉!不过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广开眼界、拓展新域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大家记得,1958年下半年在全国高校和学术界曾掀起一阵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热潮,在哲学方面主要是批判被定性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因此在之后的几年间这个批判的任务在北大自然首先落在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头上。全室教师乃至研究生大都或多或少参加了这一工作:或选译这些流派的论著作为批判的资料,或编写讲稿、撰写文章以批判其思想学说。熊伟先生昔日留德时曾是海德格尔的及门弟子,理所当然地要承担对存在主义流派的批判研究和翻译的重任。据我所记,他这一时期第一次将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做了部分章节的翻译,他翻译的《林中路》、《形而上学是什么?》、《论人道主义》等著作也是节译,曾分别发表于《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

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熊先生也写了存在主义哲学批判的讲稿(有刻写件或打印件),不记得是否给学生讲过。不过,我在1961年上半年在北师大政教系讲西方哲学史,最后一章讲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关于存在主义流派的介绍和批判就是参考了熊先生的讲稿的。我当时无意深入探研存在主义哲学,所以不曾向熊先生讨教很多有关的问题。但是对于先生所译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一文(我读的是教研室发的刻写件)中的一句话我却曾当面请问熊先生。海德格尔说:“自然若靠人从技术控制方面去探索,就刚刚不会暴露它的本质。”我在1959年和1960年写的论黑格尔和论培根的两篇文章中都引用了这句话,认为它是一种“反技术、反实践的不可知论的观点”。熊先生很谦和地对我说海德格尔对技术问题的思考有很深刻的含义,恐怕不能用一般认识论的观点去评论它。事实上我对海氏此语的看法只是从字面上的浮浅的理解,并未弄清,并

未把握其内在的深义,熊先生的点拨正是以严谨治学的要求给我一次亲切的教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几年相对平静稳定的教学科研环境到了六十年代末就完全打破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飙然而至,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又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苦难历程。熊伟先生在“文革”后的一篇文章曾坦然直言,“文化大革命”是一段“已付出血和泪”的历史。但是,对其个人在“文革”期间的遭际,先生生前却绝少谈及。我在这里仅就所知所见者略述几事或可展现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坚守的崇高人格与节操。

熊先生在“文革”中首先要承受的自然是在思想政治上的批判和打击。例如,1968年北大“清队”(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云:北大“池深王八多”,于是学生红卫兵们如获金牌,立即以“王八”、“大王八”的恶名大揪大批那些资产阶级教授、“学术权威”。记得某个晚上红卫兵们在大喇叭里点名熊伟,大喊“打倒大王八、法西斯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徒子徒孙……”

“文革”中熊先生在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折磨:红卫兵抄家,书籍、资料、手稿丢失、被毁;北大中关园住宅遭人霸占,被扫地出门,旋即逐往北大承泽园,栖身一间阴潮的斗室;后来下放江西鲤鱼洲劳动“锻炼”,我也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年近花甲的熊先生像中青年一样被安排出工劳动,在没及双胫的水田里插秧种稻,和泥砌砖盖房,挖坑淘粪,挑担负重,如此等等,“工类”繁多。

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无论是面向向来势汹汹的批判,还是在忍受沉重的生活的折磨,先生从未低下他那高贵自尊的头颅,从无畏葸、屈节、哀怜之状。我想这也正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先生之为“大勇者”的那种哲人的气度吧。

我们北大下放江西劳动的教职工是1971年9、10月间陆续返京的。回校后大部分教师回系工作,但有一部分人不能回到教学岗位,仍在校内劳动,继续接受再教育。我们哲学系有几个人,包括熊先生和我,就在此列。其时正值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听取了中央关于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材料的传达,学校工军宣队的领导要求我们参加

劳动的教师一起开一个大会,批判林彪、陈伯达这些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鼓吹的“天才论”。我们哲学系的人被要求准备一个发言,大家要我起草讲稿。我记得找了熊先生,还有一位张继安老师,共同商议。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既然林彪们讲天才,那么讲天才就一定是谬论,我们不能承认有天才。我清楚记得熊先生对这种流俗的观点大不以为然。他说,林彪讲天才有其政治目的,我们只需揭露和批判其利用讲天才搞政治阴谋就可以了,却不可把对待所谓天才论的批判变成对天才的否定论。诚然,天才不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不是不学而知,不教而能,天才的形成离不开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人的才具、自然禀赋是有差别的,而且可以是极大的差别,一个人不能只靠后天的努力而是必有过人的天赋、天资,才能成其为天才。我们不能否认天才的现象是其实存在的。接着他举了好几个古今中外天才的人物为证。对熊先生这种绝不苟同流俗、坚持独立见解的精神,我深为敬佩。

正是这种坚毅独立的精神使得